功利化创新“夹带私货”

“非升即走”应做到五个“回归”

■刘进

近年来，随着“非升即走”制度改革在国内高校逐渐铺开，与之相关的新闻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其中，有成功者的经验，也有对于某些挫折的反思。而就在不久前，复旦大学校长金力透露，复旦大学将推出“非升即走”的替代计划，不升也能留，更是引发了公众对于“非升即走”制度未来发展走向的讨论。

在笔者看来，“非升即走”制度本身具有合理性，现阶段一些问题的出现，根源在于改革要么背离该制度的原有理念、要么盲目创新，特别是功利化的创新附加了太多大学意志。

“非升即走”制度本身具有合理性，现阶段一些问题的出现，根源在于改革要么背离该制度的原有理念、要么盲目创新，特别是功利化的创新附加了太多大学意志。

两个核心问题

当前，“非升即走”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部分高校的制度改革严重背离了其设计的原始初衷。比如，“非升即走”制度设计的缘起虽包含有明确的学术评价导向，但该制度设计更主要的目标是为了最大限度保护大学教师。而目前中国的“非升即走”制度设计，却过度强调了评价属性而弱化了保护属性，反而破坏了学术职业生态，营造出高竞争、低稳定、不安全的学术场域。

另一方面，在本土化创新过程中，部分高校的“非升即走”制度设计衍生出各类问题。比如在传统“非升即走”制度基础上，人为增加学术论文数量与层次、科研经费规模、人才称号等刚性指标，本质上是通过“非升即走”制度把各类竞争性评价指标传递至青年教师。这些“夹带私货”的本土制度创新，显然背离了“非升即走”制度初衷，并带来“五唯”等各类问题。

多种负面影响

上述两大问题如果落到高校的实际管理层面，会产生一连串的负面影响。

比如，青年教师本来在职称评聘、博导申请、招生名额分配、项目申报、薪酬获取以及其他资源争夺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如果“非升即走”制度改革不利，非但不会改变青年教师境遇，反而会进一步强化青年教师与大学之间的雇用关系。

学校及院系部门等领导、学科带头人（责任教授）、各级各类学术委员成员、资深教授、本土近亲繁殖教师等，代表雇主（大学）行使评价考核权力，进而掌握更多学术话语、晋升话语和资源话语等权限，甚至直接参与青年教师“升”与“走”的决策。这会进一步弱化青年教师的社会地位，加剧他们对行政官员、资深教授等的强依附关系，也限制了青年教师的学术话语权、学术自由和创新发展活力，并可能激化矛盾。

同时，刚性评价周期可能影响重大原创性成果产出。被评价对象急于在有限周期内完成考核任务，在选题上往往避难择易，导致基础创新、原始创新、重大创新选题不足；在研究结果上可能导致“短视”“碎片化”等问题，学者或过度追逐学术热点而忽略中长期重大学术问题，或拆分甚至重复发表学术成果而无法形成重大系统性成就，或以刊评文、重视学术发表、迎合期刊而忽视研究成果本身的创新价值。

一些高校与青年教师签订的岗位责任协议，往往规定更明确、数量和质量要求更高的论文、“帽子”等显性目标，这不仅无助于改善传统人才评价弊端，反而会助长“五唯”之风。近年来，一些高校不断涌现出“90 后”甚至“95 后”教授，制造“学术明星”，带来年龄“内卷”，一些高校教师身体健康严重受损。类似现象的背后都与显性的学术人才评价文化有关。

“非升即走”制度模式下，“不发表就走人”成为主流逻辑。学术人才根据评价标准“对号入座”，能否发顶刊论文、能否评上人才称号，已经成为某些高校人才评价的指挥棒。这可能导致擅长发文、握有“帽子”的青年学者迅速取得成功，进而反向强化上述成功逻辑，进一步固化了“五唯”导向。

此外，在“非升即走”制度模式下，大学可以对教师开展中长期考察，动态作出教师聘任与否、聘任等级、薪酬水平等关键决定。作为雇主和“甲方”，大学如果时刻保持对青年教师的高压考核，虽然容易促成青年教师不断产出各类成果，进而增强学术职业活力，但也增加了大学对于管理对象进行“学术盘剥”的可能性。

比如在人事招聘环节，一些高校聘任了远超预期留任教师规模的青年教师，导致青年教师入职后无论多么努力，最终都会遭遇大比例淘汰，但大学在此过程中却积累了大量由青年教师创造的教育成果。这客观促进了大学排名等进步，却对青年教师有失公平。

又如，一些高校“非升即走”标准模糊，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动态调整“非升即走”考核标准，或根据教师表现动态设定分流比例（如末位淘汰）。类似做法也严重破坏大学与教师的契约关系，导致青年教师的学术职业稳定性、安全感、幸福感大幅下降。

力争五大“回归”

在笔者看来，未来我国“非升即走”制度改革首先要回归评价与保护教师的基本立场。从历史看，“非升即走”制度设计虽然包含有评价和分流教师目标的任务，但更核心目标是通过评价遴选出合格教师，并为其创造安全、稳定、自由的学术环境。

中国高校“非升即走”制度改革应回归本源与初心，在现行制度体系过度重视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大幅增加有关保护教师权益、稳定教师队伍、营造安全学术环境的理念与制度举措。

其次，要回归“保护大多数、分流极少数”的基本理念。大学与教师间不是完全市场意义上的雇用与被雇用、管理与被管理、考核与被考核的从属关系，中国“非升即走”制度改革应限制高校权限，限制既得利益者权力，提升新入职教师地位，降低教师考核与分流焦虑，舒缓教师对于大学的敌视、对抗、博弈情绪。

这其中的关键是不能明确或隐形设置“非升即走”分流比例，不能过度频繁调整评价标准，不因为后来聘任者的学术产出能力提升而动态增加或拔高评价标准，不设置教师横向比选分流方案。应遵循“保护大多数、分流极少数”的制度共识，对于被分流对象尽可能提供更多机会、提早告知可能结果、协助进行流动安置。

第三是回归立德树人教师评价的基本方向。国外“非升即走”制度评价的核心方向是教师的育人职能发挥情况，而非单纯的论文、项目、“帽子”等显性成果。

当前，国内不同院校、学科虽有实际情况差异，但人才评价仍应以立德树人为核心。“非升即走”评价导向应全面覆盖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国际化、同行影响力等诸多方面，构建多元化评价、多样化成才的学术人才评价体系。

第四是回归学者独立属性的基本目标。目前一些国家明确规定不允许青年教师加入任何现有课题组，在迫使青年学者开展原创性研究的同时，也避免了其在学术生涯早期遭遇学术压榨与学术盘剥。

当前，国内高校应更多鼓励青年学者独立开展教育活动，适度解除新入职教师对于传统教育体系，尤其是既得利益群体的依附关系，避免青年学者成为廉价学术劳动力，多鼓励青年学者开展原创性学术研究活动。

最后是回归良性的学术文化。国内“非升即走”制度改革应更多营造形成良性竞争与合作的学术场域，为教师提供安居乐业与从容治学的良好环境，采取有力举措降低教师职业焦虑，纾解学术职业内卷文化，鼓励竞争合作并重。

特别是在人才评聘、项目申报、人才称号申请过程中，应取消年龄、职称等前置“门槛”，营造更公平的学术环境。明确反对“学术造星”运动，遏制教育焦虑与“五唯”蔓延，努力形成面向基础创新、原始创新、重大创新的宽松、宽容的学术文化，保障学者开展长线研究活动的宽松氛围。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四个『价值关切』

■徐平 李法云

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创新和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意境高远、内涵丰富。其内含的四个重要“价值关切”构成了该思想的核心要义，不仅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也成为世界生态文明发展的思想引领。

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明思想。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因此，人类必须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是人与自然相处应秉持的首要态度；顺应自然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保护自然则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承担的重要责任。

我国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以前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过多，生态环境压力巨大。全党全社会务必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保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格局。

中国人民的生活福祉。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人民利益的根本政治立场，提出了“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文明思想。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全党全社会要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让广大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和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

经济社会的发展质量。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文明的要义是处理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强调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以效率、和谐、可持续为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

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有机整体。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就要跳出陈旧的“逻辑怪圈”，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人类文明的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高度，提出了“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的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文明不仅是中国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传统工业化迅猛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不断触及自然生态的边界和底线，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平衡，人与自然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

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中国已经将生态文明领域合作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点内容，发起了一系列绿色行动倡议，采取了一系列绿色发展举措，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

中国将一如既往地积极顺应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抓住绿色转型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以创新为驱动力，大力推进经济、能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作者分别为中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美丽中国与生态文明研究院〈上海高校智库〉教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研究”〈21KSD500〉阶段性成果）

上天入地下海登极：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时代贡献

■本报通讯员 曹南燕 宁薇

从探月工程到大陆深钻，从载人航天到南海探测，从南北极科考到世界屋脊……建校 70 年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以下简称地大）始终与国同行，充分发挥学科特色和科研优势，砥砺耕耘，积极为“上天、入地、下海、登极”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贡献了一批高质量创新成果。

◀肖龙教授（中）在柴达木盆地进行类火星地貌考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供图

▶殷鸿福院士（左）80 多岁时仍坚持野外科考。 张睿摄

上天：研究行星科学，助力深空探测

地大人登月梦想的开始源于嫦娥之父、1956 届校友欧阳自远。随着 2004 年嫦娥工程启动，欧阳自远承担了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的重任。一代又一代地大人比肩接迹，全力探索天空的奥秘。

地大行星科学研究所所长肖龙作为嫦娥五号钻取子系统飞控专家组成员，参与了嫦娥五号取土作业的两项关键任务——模拟月壤和采样点地质地貌地图绘制。

肖龙团队从 2009 年开始做模拟月壤。10 年间，他带领团队北至黑龙江、南到海南，收集各种岩石和土壤，研制出成分、颗粒、形态等都与月球相似的模拟月壤，共 60 多个种类。经过反复筛选、上千次的试验，其中的 10 多种最终被确认为试验用月球土壤。该团队先后提供了 100 多吨用于月面采样工程技术验证的模拟月壤。

2020 年，嫦娥五号样品舱带回了 1731 克月球样品，这是我国首次完成地外天体样品采集。地大教授汪在聪、肖龙、张昊和博士何琦先后成功申请到月球土壤样品，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

地大教授佘振兵和汪在聪团队开发了一种样品消耗极低的新技术，可同时测定月壤的粒度和矿物组成，对于解释月球深空探测轨道遥感光谱数据和空间风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何琦对嫦娥五号样品中玄武岩岩浆的起源和后期分异提出了新解释，为认识月球岩浆演化提供了新思路。

在对嫦娥五号玄武岩来源进行溯源分析时，该校博士钱煜奇等新发现了一条月溪，并得到国际天文联合会的认可，将其命名为“卢维尔月溪”。

如今，地大成立了“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行星地质探测与研究分中心”，参与了月球和深空探测科学目标制定以及月球、火星探测数据处理和科学应用研究，自主研发的 MAPGIS 软件成功应用于“神舟”系列载人航天搜救。此外，肖龙带领团队在柴达木盆地进行了 8 年火星类比研究，论证了该地区作为类火星地貌研究基地所具备的条件，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入地：参与国家重大工程，求索地球深处奥秘

自从产生智慧以来，人类就从未停止过对自然界的探索。然而相比“上天”，由于地壳岩石重重阻隔，人类对地下世界知之甚少，“上天难入地更难”。

“作为地球科学特色显明的高水平大学，围绕美丽中国和宜居地球建设，更深层次地认知地球，更可持续开发利用地球资源，更为有效治理人与自然共生，是地大人的职责，更是使命。”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如是说。

为此，一大批地大人活跃在国家重点单位的生产科研一线，致力探索地球深处的奥秘——

中国科学院院士殷鸿福倡导和开创了古生物地理学等一系列分支学科，提出了中国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和发展战略，并领导科研团队克难攻坚，使国际地质学热点——古、中生代界线的全球层型（金钉子）得以设在浙江省长兴县，为国际领先水平。

中国科学院院士金振民担任了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钻孔深度 5000 米）现场指挥部副总地质师，负责岩石物理性质实验室，探索地球内部构造的秘密。

中国科学院院士谢树成、殷鸿福等与英国学者携手，借助地球环境事件的“指纹”——煤山二叠纪三叠纪界线附近的“分子化石”，探究了 2.5 亿年前地球生物大灭绝的原因。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科技期刊《自然》上。

地大教授乌效鸣、胡郁乐，副教授张慧等积极参与全球首个钻穿白垩系的科学钻井——松科二井的钻井工作。乌效鸣等研制的超高温水基钻井液配方，经受住了井底 240℃以上温度的考验，刷新了我国水基钻井液应用的最高温度纪录，实现了泥浆各开次的平稳过渡，保障了钻孔的安全性，同时为解决超万米深部钻探、干热岩勘探开发等面临的超高温泥浆难题提供了技术储备。

随着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实施，生态长江、绿色发展成为当前重点。地大师生以多种方式呵护生态长江——

40 年来，该校教授李长安全情投入长江流域环境保护，被誉为“山水教授”。

地大两次组建大学生长江源科考队，赴各拉丹东长江源头考察，同时进行野外教学活动、地球科学知识科普和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唱响“长江大保护”青春赞歌。

历经 5 年，地大“长江流域地质过程及资源环境研究计划”深入系统地研究长江流域深部与表层及其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过程与演化，保障长江流域生态安全。

下海：服务海洋事业，逐梦“蓝色国土”

地大人的海洋情结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中国科学院院士郝诒纯为首的研究集体，相继在西沙海槽和冲绳海槽开展微体古生物和沉积学的工作，在学界影响甚广。在莺歌海盆地、珠江口盆地等中国近海海区，地大教授李思田开展含油气盆地及海洋油气勘探分析与研究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秉承师者本心，心系南海。近年来，地大教授解习农团队瞄准国家重大需求，连续 3 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30 多年来，由他领衔的研究团队一直开展南海沉积学研究，提出了陆架坡折带和轴向峡谷的控砂模式，在中海油深水油气勘探中得到推广应用，为我国首个自营深水大气田“深海 1 号”的发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有力的技术支撑。

海洋学院年轻教授脱颖而出。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孙启良聚焦于海洋地质灾害研究，提出了诱发海底失稳的新机制，建立了精确计算海底滑坡体积的新方法，增强了潜在海底滑坡及海啸的预测能力。近日，该校教授宫勋研究团队在《自然－通讯》9 月刊上发表两篇论文，探究了海洋与全球变暖的成因联系，指出在现代及未来全球变暖背景下，泛北极地区径流入海热通量将对北极海冰的快速消融起到重要驱动作用。

此外，在南海深水油气勘探、渤海湾盆地油气勘探、我国首次海域可燃冰试采、大洋钻探项目 ODP 和 IODP 科学调查以及国家大洋环球航次等重大海洋科学研究和科学考察工作中，地大人的身影亦是时时可见。

面向“十四五”，地大正依托综合学科优势，围绕国家能源安全和海洋强国战略，加快广州南沙地大滨海研究院建设，发展海洋学科群，形成海洋地学创新合力，力争为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和海洋人才培养作出更大贡献。

登极：无限风光在险峰，勇攀新高峰

地大一直有着深厚的体育传统，特别是在登山领域赫赫有名。建校 70 年来，该校培养了 6000 多名登山运动员，撑起中国登山界的半壁江山，是名副其实的攀登者“黄埔军校”。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地大的体育最先是为地学而生的。地大人眼中的“登极”，不仅仅是登上世界最高峰和南北两极，而且要开展极地以及第三极——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和研究。

在杨遵仪、王鸿祯、池际尚等著名地质学家带领下，一代代登山科考师生薪火相传，对珠峰、阿里、三江源等地进行地质考察，取得了一批开拓性成果。《西藏阿里地质》《西藏阿里古生物》等著作填补了我国西藏高山地区相关研究的空白。

将登山与地学科考相结合的特色和优势一直延续至今。

2012 年起，地大发起并实施“7+2”登山科考活动。所谓“7+2”，指攀登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和徒步南、北两极极点，代表着极限探险的至高境界。2016 年 12 月 25 日 6 点 16 分，登山队滑雪徒步 110 公里抵达南极点，圆满完成“7＋2”登山科考计划，成为了世界上首支由在校师生组队实现这一壮举的大学登山队，创造了中国高校体育运动史上的传奇。

该校教授陈刚周密地考察了南极点附近的板块运动状况及地学特性，这对南极现代地壳运动和内陆冰盖及其动力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火炬珠峰传递、2020 年珠峰高程测量和 2022“巅峰使命”珠峰科考等国家重大登山活动中，“地大军团”也冲锋在前，积极贡献“地大智慧”。

攀登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地质人勇攀自然高峰和科学高峰。经过 70 年的发展，地大科学研究站上全新的历史起点，在地学研究领域地大研究水平和影响力持续上升。地球科学学科在《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中位列全球第 26 位，是湖北省 3 个进入 ESI 全球前 30 名的学科之一。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学校绝大多数学科排名位次提升，地质学和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两个学科继续排名全国第一，12 个学科跻身全国前 30%。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党委书记黄晓玫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地大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有组织科技创新，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增强科技创新竞争力，努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人才和科技支撑。”